

东亚经纬

2015年第3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日本的高铁出口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郭万平).....	1
安倍第二任期对朝政策调整的实质(姜龙范).....	7
敦煌本《开蒙要训》研究的新成果	
—《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述评(郜同麟).....	11
在华神社研究—以东北地区侵略神社为中心(陈小法).....	14
梅德韦杰夫再登争议岛屿高调宣示主权	
安倍希望继续保持对话(尹虎).....	22
◆学术动态	25
◆征稿启事	3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2015年9月30日

日本的高铁出口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郭万平

日本是世界高速铁路的创始国，世界上第一条高铁东海道新干线于 1964 年 10 月正式开通。目前日本新干线共拥有 6 条，另有 2 条迷你型新干线，其总里程达到 2892 公里，年间乘客数约 3.34 亿人。新干线技术成熟，运行稳定舒适，安全性较高，是日本高铁的代名词。由于日本逐步迈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人口减少，国内市场规模缩小，积累了五十余年的高铁技术也面临老化困境。同时，随着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和中国高铁技术的日臻成熟，中国政府在规划、实施“一带一路”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提出并加速实施“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将高铁出口上升至“高铁外交”的层面，大大地提高了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刺激，日本以纪念新干线开通 50 周年、备战 2020 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安倍内阁将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成长战略”重要支柱，制定了“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

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的高铁事业后来居上，自 1998 年创始至今，运营总里程达到 1.6 万公里（占全球总里程的 60%），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公认的头号高铁大国，是世界上高铁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运行环境最复杂、乘客数量最多、在建规模最大、出口实力最雄厚的国家。

据日本经济协力机构调查可知，2015-30 年，全球交通设施需求量将增加 5 倍，年均可能达到 59 兆日元，其中高铁是基础设施的重

中之重。目前在全球高铁市场，日本与中国展开了贴身竞争，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重要对手。中日高铁之争，不仅与商业利益有关，也关乎国家荣誉和地缘政治。面对来自中国竞争的巨大压力，有日本专家甚至建议“即使零元中标也应该拿下订单”。

本文主要参考了日本的法律法令、内阁法案、官报、白皮书、报告书、统计年鉴和首相官邸、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川崎重工、JR 东日本等官网以及中日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等，旨在通过分析日本的高铁战略和高铁外销手段、海外市场的现状与前景，为我国的“高铁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一、日本高铁出口战略

日本高铁出口政策肇始于 2009 年 6 月，麻生太郎内阁通过“成长战略”，把高铁出口作为经济政策之一环。民主党执政时期，也继续促进高铁出口事业。2013 年 6 月，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将安倍经济学所谓第三支箭的新成长战略命名为《日本复兴战略》，迄今已修订两次。《日本复兴战略》中的“国际展开战略”，确定了高铁等基础设施出口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措施。安倍内阁基于海外日益增长的购买力需要和推销日本引以自豪的新干线技术，将以高铁出口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置于成长战略的核心，将强大的日本技术出口国外，体现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彰显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技术和经济实力。

2013 年 3 月，日本政府新设了以内阁官方长官为议长、各相关大臣为成员的“经济协作基础设施体系战略会议”，讨论、指导和协调以高铁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出口事宜，该战略会议迄今已经召开了 19 次专门会议，其中第 16 次会议就如何加强高铁出口问题进行了商讨和布局。该战略会议还以决议形式，颁布了《基础设施体系输出战略》，较系统地阐述了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的宗旨、具体策略、出口方针等，其中有关高铁的论述较全面。2013 年 6 月，《日本复兴战略》再次强

调了作为新成长战略基石的“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的重要意义，确定 2020 年基础设施出口订单目标为 30 兆日元，其中高铁 1.6 兆日元。

2013 年 4 月，国土交通省设立了安倍晋三首相授权的一般社团法人“海外铁道技术协力协会”，与日本各铁路以及相关民企携手，通过在海外宣传日本高铁企业和新干线技术、调查、搜集和分析国外高铁相关信息、邀请海外铁路部门主管人员参观考察新干线，增强他们对新干线的了解和支持。由该协会编纂的《新干线与世界高铁》（年刊）提供了最新的海外高铁信息，在欧美诸国有广泛影响。

2014 年 4 月，日本政府又以立法形式推进高铁出口战略，颁布实施《株式会社海外交通、都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法》，并以该法令为依据，成立了“海外交通和都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该机构主要帮助日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并以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为中心。它在成立后的首个目标项目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铁。

此外，日本高铁装备制造企业凝聚力比较强，他们在国内成立了日本铁路与车辆出口协会（JORSA），向外国宣传日本的高铁技术和装备以及出口情况，搜集并共享海外高铁计划信息，强化日本高铁出口的行业基础，减少日企间的无为竞争，从而抱团出海，扩大日本在世界高铁市场的份额。

2015 年 5 月，安倍晋三在东京召开的“第 21 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上，宣布被称作“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计划，日本政府在今后 5 年投资大约 1100 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民营企业合作，投资亚洲和中南美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其中，铁路相关技术与产品输出是主力。据专家分析，这一数字颇具深意，刚好超出亚投行的资本金 1000 亿美元，安倍的计划也因此被广泛解读为抗衡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

二、日本高铁外销手段和海外市场前景

1988 年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以后，政府与铁路企业基本上是独立的，高铁出口的先行者一般是高铁民企，其目的主要是赢取企业利益。然而，随着高铁逐步成为日本成长战略的重要一环，高铁企业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没有日本政府作为高铁出口的坚强后盾，这些民企将寸步难行，无法参与到竞争激烈的国际高铁市场。

2013 年以后，日本高铁出口基本上以国土交通省为核心在推行，政府成为高铁出口的主导者，而高铁企业成为执行者。尤其是东南亚高铁出口策略，几乎全部以政府为中心在运作。当然，高铁企业依然发挥着主体作用，如美国高铁项目，则以 JR 东海等民企为中心在推动。也就是说，日本高铁出口方式是政府与民企互相协作的混合方式。

日本高铁表面上的竞争对手为中国，实际上还有欧美的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由于中日两国在海外努力开拓高铁项目，使两国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步改变了加、德、法三国高铁公司垄断全球高铁市场的格局。但全球新兴市场对高铁的最新需求将中日竞争放在了一起，尤其是在亚洲。

关于日本高铁海外出口的手段，以往主要采用阶段性推销手段，首先推销车辆、零部件等，取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信任后，再争取大规模高铁计划，如日本在英国的高铁出口项目。但 2013 年后，随着《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的出台，日本的高铁出口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大规模地推进高铁出口。具体而言，日本高铁出口战略的措施主要有：

(1) 高端推销 (top sales)，这是日本首相、政府高官、公司高层等直接海外推销的形式，是日本高铁出口的政治后援，体现了日本高铁出口战略的官民一体的理念。安倍晋三首相、太田昭宏国土交通大臣等人，不失时机地对外宣传、推广日本高铁。如因安倍等政府高官的主动推销，2014 年日本的基础设施出口达 9.3 兆亿日元（其中出口英国的高铁设备为 1800 亿日元），是前年的 3 倍。据日本 NHK 电视台 7 月 7 日报道，安倍晋三在东京召开的世界高铁国际会议上表示，“希望向海外推广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世界作出贡献”。同时呼吁各

国引进日本的铁路技术，宣传新干线的魅力。在日本的高端推销下，美国、印度、印尼等均有与日本合作的意向。

（2）确立政府金融支援制度，降低风险成本，这是日本高铁出口政策的资金支援。为了促进日本高铁民企进入国际市场，日本政府在立法的基础上，成立了株式会社海外交通、都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以官民协作的方式，动员民间资金积极投资，并促使国际协力银行为日本民企承担的外国高铁项目融资，减轻对象国的资金压力。此外，对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铁项目，则采取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资金（ODA）方式予以资助。

（3）积极推行日本高铁的“国际标准”，这是日本高铁出口政策的技术支援。由于欧洲铁路事业发展起步早，国际市场份额大，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欧洲高铁标准。若日本继续推行新干线技术，则大大影响其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目前在极力推行日本型高铁国际标准，2010年4月，在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下设“铁道国际规格中心”，并在国际标准化机构（ISO）铁路专门委员会和国际电器标准会议（IEC）铁路专门委员会上大力宣传日本新干线技术。此外，还在交通安全环境研究所设置国际规格认证机构。

（4）日本在强调宣传新干线安全、准时、舒适等优点的同时，也提出“顾客本位”、以综合服务为宗旨的推销策略。

关于日本的高铁海外市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预测，2020年日本海外高铁订单为1.6兆日元，年增长率为2.5%，而亚洲市场为最大市场，其中东南亚市场巨大。安倍认为，东南亚是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跨国高铁计划（马来西亚-新加坡）酝酿已久，是日本极力追逐的目标。除此之外，日本的海外高铁目标市场还有印度、泰国、美国、俄罗斯等。以上区域将是中日高铁竞争的主战场。

三、对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就“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和中日高铁出口竞争，

笔者提出以下粗浅看法或建议：

(1) 尽快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和专业机构。在国资委或交通运输部设立高铁出口工作指导委员会（高铁战略指导委员会），制订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和具体措施，协调国务院各部委和高铁相关企业，在国内外积极推进制订世界高铁的“中国标准”，努力使“高铁走出去”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助推器，也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另外以“中铁”为首，成立高铁出口企业协会等专业机构。

(2) 加强中国高铁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通过国家领导人各种场合的推介宣传、互联网、杂志（中外文）、国际会议、高铁从业人员培训等手段来实现。

(3) 明确高铁出口主战场。结合中国高铁的实际和国际关系，明确阶段性高铁出口目标，如现阶段与日本争夺俄罗斯、印度、东南亚、非洲等高铁市场。

(4) 优先发展欧亚大陆桥的高铁货运业务。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新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优先发展欧亚大陆桥的高铁货运业务。

安倍第二任期对朝政策调整的实质

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姜龙范

在安倍晋三继任首相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内，朝鲜恶化地区局势的举动一直没有中断。在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不久，朝鲜便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而在 2014 年朝鲜进行的导弹试射就达 18 次之多，从而导致朝鲜的导弹试射成为“常态”，似乎已经难以再引发日本以及周边其他国家的过多关注。与此同时，朝鲜的核武器研发计划也仍在全力推进，谁也无法判断朝鲜将于何时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日朝两国之间围绕“绑架问题”的互动却出乎世人预料的紧锣密鼓地展开。从日本政府在近两年多时间内的积极动向来看，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以后将“绑架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与其前任相比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以期实现突破。安倍晋三也曾明确表示：“不到所有的绑架受害者家属都能亲手拥抱亲人的那一天，我们的使命就不会终结”。可以说，力图在第二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是安倍首相的夙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绑架问题”上实现突破，并不意味着日朝两国关系将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此次安倍首相积极推进“绑架问题”的解决，不能不说其在政治上的投机目的十分明显。作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得力助手及其访问朝鲜时的主要陪同人员，“绑架问题”对于安倍晋三而言着实是其可以利用和发挥的难得的政治资本。据此也更容易理解为何再次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会一改日本政府对朝政策上一贯以来坚持的“一揽子”解决计划，将“绑架问题”独立置于优先地位并力促其实现突破。在“绑架问题”上，安倍首相更进一步的期许恐怕是借“绑架问题”的突破来实现其对朝鲜的访问，以此获得与小泉前首相同样的赞誉来彪炳功绩，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此外，由于强力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首相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受

到了严重影响。如何挽救个人声望、恢复内阁支持率，正在逐步成为安倍首相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无法有效抵消因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带来的冲击，从而“绑架问题”便再次成为安倍首相为获取政治资本而凭借的关键手段。

其次，就“绑架问题”本身而言，与以往不同的是，朝鲜方面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设立了具有极高实质性权力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从而改变了此前持有的一贯立场，在事实上承认了“绑架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朝鲜方面采取这一措施的初衷，是换取日本解除其单方面制裁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并非是为了彻底解决“绑架问题”。在目的上日朝两国存在根本差异。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彻底解决所谓“绑架问题”需要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所有的绑架受害者必须回国、朝鲜必须公开绑架真相以及朝鲜必须向日本引渡绑架犯人。对于这三个条件，朝鲜能否全部实现或能够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尚无法确知。而且，相信朝鲜方面不会放弃这一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谋求实利的机会。回顾两国围绕“绑架问题”而进行的外交互动，既发生过朝鲜方面矢口否认与中途改口的情况，又有过日本方面突然增加失踪人员名单的经历。进而观之，解决“绑架问题”需面对的首要难题实际上是日朝两国之间如何建立对彼此的相互信任，这也是两国能否持续推进“绑架问题”解决进程的基本前提。由此来看，“绑架问题”的未来发展仍然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安倍首相欲在其第二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的良好期望恐怕难以顺利实现。

再次，从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来看，日本的这次对朝政策调整，实有违与美韩两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已经达成的协调。对于2013年5月间的饭岛勋访问朝鲜一事，日本政府没有预先同美韩两国进行应有的沟通，而是在其访问已被朝鲜媒体曝光之后才向美韩等有关国家进行通报。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安倍内阁在“绑架问题”上能有所突破，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外部局势。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不顺畅、中朝关系的持续冷淡以及朝鲜方面欲借与日本关系松动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等这些外部条件，在客

观上促进了日朝关系的松动。对此，日本的朝鲜政治问题专家矶崎敦仁也不得不承认：“中朝、朝韩关系越恶化，情况对日朝关系就越有利。现在，日韩关系也已恶化，无需事前与韩国沟通，日本可以自行其是。这对日本外交来说机不可失”。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随着美韩两国不满的加重，尤其是美国压力的持续增加，日本最终将返回到三方协调机制中来。对于安倍首相可能的访朝意图，美国方面已经多次予以警告和劝止。受三方协调机制的限制，日本政府对朝鲜外交上能够继续推动的只有维持和巩固现有的成果，日朝两国关系难有更为深入的缓和。更何况安倍内阁此次对朝缓和是建立在对华强硬的基础之上，符合美国重返亚太以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解除的也只是其独自在联合国框架之外采取的对朝单边制裁措施。

最后，从前述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内在逻辑来看，在“绑架问题”上的缓和与突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朝关系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绑架问题”是直接牵涉到日本和朝鲜的双边问题，它能否顺利解决的根本还在于两国政府的诚意。对日本而言，“绑架问题”被复杂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国内民众的强烈诉求，还在于其国内政治家的利用与投机。此外，更可以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策略进行解读：无论是“一揽子计划”还是被置于独立的地位，其都是日本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将“绑架问题”置于“一揽子计划”之中，有利于日本全面介入以朝鲜核问题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事务，进而不至于在“六方会谈”以及地区国际关系中被边缘化。而将“绑架问题”抽出来置于独立地位以加速推进，则有利于通过日朝关系的松动来缓解时任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困境。为实现其成为军事大国的目标，日本仍旧需要借助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来渲染外部威胁，从而其并不希望这两个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目前，日本政府将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并大肆加以渲染和鼓噪，但是其最终也无法避免在地区内与中国实现和平共处。只要还未确立军事大国地位，当中日关系缓和之时，关于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的鼓噪在日本国内必然又甚嚣尘上。在没有彻底

实现对“和平宪法”的全面修正以前，日本政府实际上也并不急于缓和和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态度以推进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据此，在日朝关系的诸“悬案”之中，也只有“绑架问题”能够作为一个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来保持日本与朝鲜在不同层面的接触与沟通。

敦煌本《开蒙要训》研究的新成果

——《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郜同麟

中国在编写儿童识字课本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先秦的《史籀篇》，至秦汉的《仓颉篇》、《急就篇》，乃至后世的《千字文》、《三字经》，两千多年来，各种识字蒙书层出不穷。但这些蒙书今天多已不存于世，如唐以前的识字蒙书完整流传至今的，不过《急就篇》、《千字文》二书而已。幸运地是，一百多年前敦煌藏经洞的开启，为我们打开了一座古代文献的宝库，其中发现了包括《千字文》、《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蒙求》、《新集文词九经抄》、《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在内的蒙书多种。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古代蒙书的原貌，还可由此了解古代儿童教育乃至社会风俗方面的种种细节。

然而，敦煌文献中的这些材料，对于一般学者而言，利用起来并非易事。首先，这些材料分散各处，分别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多个国家或地区，且都按流水号编排，不易收集。其次，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不少敦煌写卷被分割为多个部分，要将各个部分收集起来并拼合在一起，非常困难。再次，敦煌文献中俗字、别字极多，蒙书的抄写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由于上述种种困难，虽然《开蒙要训》进入学者的视野已近百年，但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其中甚至还有不少疏漏存在。但在张新朋先生《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一书出版后，这一状况终于终结了。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篇”，为《开蒙要训》的各种敦煌写本做了详细的叙录，并探讨了《开蒙要训》的研究价值和写本特征，又对该书做了语言学、校勘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并与《千字文》做对比研究。该书下编为《开蒙要训》的校录，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可

靠的《开蒙要训》定本，书末则附有入校的几种《开蒙要训》写本的图版，以便学者对照。

张新朋先生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童蒙读物的研究工作。多年的积累，使他对于敦煌吐鲁番童蒙读物了然于心，在敦煌吐鲁番童蒙整理方面颇具功力。其中最见功力的是敦煌本《开蒙要训》和《千字文》抄本系统的梳理。在本书撰写之前，学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所论及的《开蒙要训》和《千字文》写卷书目分别为 37 件和 42 件。张新朋先生先后多次对《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宝藏》、《敦煌秘笈》等诸多敦煌文献大型图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最终从中又新认定《开蒙要训》抄本 42 件，新认定《千字文》抄本近百件，这些新认定的写卷中，多为首尾不全的断章残篇，所存文字多者数十行，少者则仅有一两字。通过有限的信息，来确定其为《开蒙要训》、《千字文》抄本，甚非易事，由此可见作者功力之深！该书对各件写卷做了详细的叙录，基本穷尽了该书结稿时已公布敦煌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千字文》抄本。除此之外，作者还对那些原本属于同一写卷，但后来因自然或人为原因而身首异处、四分五裂的写卷加以缀合。如第 54 页，作者将 13 件碎片缀合为一长卷，着实令人叹服。又如第 137 页，Дх . 11092 的一个修补残片仅存一字，作者也能敏锐地发现、识别，并与 Дх . 19085 等较大写卷缀合，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写卷的本来面貌。诸如此类的完美缀合，读来令人击节称赏，不能自己。作者在梳理《开蒙要训》抄本系统的基础上，又对《开蒙要训》做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对敦煌本《开蒙要训》的语言学研究由来已久，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便是《开蒙要训》的直音材料，但因当时条件限制，罗先生书中还有不少问题未能解决。《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作者即指出罗先生书中的二点缺憾：一方面，因当时公布的《开蒙要训》抄本较少，文字不易校正，故罗先生书中使用了不少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例证；另一方面，Дх . 19083+P. 3243 写卷也有不少音注材料，因当时尚未公布，罗先生的书未及利用。

除了音韵学的研究外，本书在文字学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收字繁富，但近代汉字却是它们的薄弱环节，字头多有遗漏，部分字头引证滞后或无例证，《开蒙要训》中丰富的俗字材料正可作为这些字典的补充。《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一书即为《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典补充了不少的字头和例证。

在校勘学方面，《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开蒙要训》精校本，还对《开蒙要训》各抄本间的异文做了详细分析，厘清了异文的种类和产生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开蒙要训》校勘，对其它文献的校理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下编提供了一个目前最为完善的《开蒙要训》的校注整理本。众所周知，《开蒙要训》是一部古代的识字课本。经过作者的精校，该书的《开蒙要训》校录本也可以成为现代研究者的“识字课本”，只不过识的俗讹字、异体字。

《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一书在文献学、语言学方面收获颇多，但在古代名物、古代文化史等其它方面的研究则稍嫌不足。如《开蒙要训》中名物词居多，本书在第三章也涉及了部分内容。但作者若能结合名物学、博物学，并参考考古实物、图像，对古代物质文化史做深入挖掘，则对此书的利用能更加充分，也能给学术界带来更大的贡献。

在华神社研究

——以东北地区侵略神社为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陈小法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尤其是农村，一度出现了买卖子女的现象。据说当时非常流行一首《马贼之歌》，歌中唱道：“因我也去，你也去吧！狭小日本已住厌。”去哪里？当然主要就是富饶的东三省。

在关东军将校石原莞尔、东宫铁男等人的积极鼓吹下，移民“王城乐土”很快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10月5日，第一个移民团的497人从神户出发赴佳木斯，日本把它称为“弥荣开拓团”。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开始了移民高潮。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象这种用武力征服当地居民的“满洲开拓团”人数达到27万之多。这不仅给我东三省人民带来了又一深重灾难，也使得日本自食恶果，致使8万多日本人客死他乡，而“残留孤儿”的安置问题影响至今。

一、东北第一神社——安东神社

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侵略野心日益膨胀。该年的4月，宫内省掌典佐伯有义在日本的《全国神职会会报》卷头发表了“在海外新设神社”一文，文中提到：

我们的同胞在海外已达十五万人，其中超过二千人以上的城市已达二十多个。在国内，哪怕再偏僻，只要有五户、十户居民，肯定有氏族神社。因此，从远离祖国的同胞们的精神安慰来考虑，新建神社迫在眉睫。同时，怀柔土人、沐浴皇化、彻底同化我国风也显得十分重要。其中有效的手段就是建造神社，举行严肃的祭奠，让他们感受我帝国的礼容和君子仪态，进而从

内心同化他们,相信对实现皇德普照也是非常的有益。因此,急切希望在清、韩两国新建神社。

文章中除了对中、韩两国人民的歧视外,也赤裸裸地说明了在殖民地建造神社的目的。我们从日本政府之后采取的行动也可以发现,上述佐伯有义的倡议其实是日本当代表性“呼声”。果不然,同年的10月3日,安东大神宫(安东神社前身)以惊人的速度落成了,虽然与佐伯有义的请求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到1910年6月为止,东北地区的千山神社(1908年)、关水神社(1908年)、大连神社(1909年)、抚顺神社(1909年)、辽阳神社(1909年)、公主岭神社(1909年)、铁岭稻荷神社(1910年)、八幡宫(1912年)相继建成。



图1 安东神社旧影

安东大神宫的原址在当时的“安东县五番通七丁目”,起初是安东县军政署的神宫遥拜所,里面供奉了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病死的12位将校、1079名士兵的骨灰。1910年8月,日军组选成立“安东神社建设委员会”,9月完成征地,10月本殿、社务所竣工。11月2日,奉命持新铸的神镜参拜伊势神宫的内务省神职人员市本宪政回到安东,3日的“天长节”即明治天皇生日进行了神社的镇座仪式,“大神

宫”由此改称“安东神社”，祭神为“天照大神”。这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神社之一。

二、东北“在华神社”的复杂性

据日本学者嵯峨井建、近藤喜博等人的统计，安东神社建成后，直至伪满洲国建立前的1932年，东北地区有神社48座左右。但伪满洲国建立后，数量剧增，1940年增至190座，1941年达241座，到1945年至少有357座。

东三省的“在华神社”不同于我国的其他地区，一是数量之多，二是性质复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大量日本人的武装移民、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日军侵占东北。因此，日本神道研究者嵯峨井建主张把这地区的神社分为五种类型：

(1) “国家”神社：即由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创建的神社，如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

(2) 都市神社：主要创建于“满铁”附属地和日本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如新京神社、奉天神社、营口神社、公主岭神社、大连神社等；



图2 奉天神社旧影



图3 大连神社旧影

(3) 移民神社：作为移民的精神寄托而创建，如弥荣神社、驿马神社、读书神社、藏王神社、香兰神社、大八浪神社等；

(4) 军队神社：作为“皇军”的象征创建于各部队内。如位于中苏边境的虎头国境守备队里的守护神社、七三一细菌部队内的东乡神社等；

(5) 其它神社：如供奉郑孝胥的太夷宫、“满洲建国大学”内的神社等。



图4 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校舍旧影

三、首座移民神社——弥荣神社

前面提及的首批日本武装移民于 1933 年 4 月到达当时伪满洲国的桦川县永丰镇，霸占了当地土地强行扎营。这个被称作“试验移民”的半武装团体，到佳木斯后并非一帆风顺，受到了以“红枪会”为首的抗日游击队的抵抗，多名日本人死亡。鉴于对死者的慰灵和活人的精神麻醉，9 月，以移民团团长沙崎芳雄为首的团领导决定在永丰镇八里岗创建“弥荣神社”。所谓“弥荣”，是指日本人在三呼万岁时的祈祷声。10 月 14 日，神社完工，祭神为“天照大神”，神主为陆军步兵一等兵的宇佐美捨次郎，境内建有广场。1935 年，永丰镇的移民团改称“弥荣村”，并宣布独立自主。



图 5 弥荣神社旧影

说起移民神社的性质，大多日本学者主张纯属“移民自用”，否

认其侵略性。其实，判断一个移民神社的性质，仅看表面还不够，而是要从移民的性质来分析。诚如上述，弥荣移民不是一支普通农业移民，而是武装侵略移民，其下设 4 个步兵中队，12 个小队，还有炮兵 1 队、机关枪 1 队。日本想借此改变我东北的民族构成，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优势，反客为主，从而霸占东北。所以伴随它的神社当然具备了侵略性。

谈到移民，自然会想到有很多日本移民的夏威夷。在那里，得到确认的神社有 59 座。可以说，至今为止日本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夏威夷的神社纯粹是移民神社，没有反美因素，当然这种观点也贯穿在大量建在我东三省的所谓移民神社中。但是，对于本地的美国人，国家神道的化身——神社又是怎样一种存在呢？1945 年 12 月 15 日盟军发表《神道指令》后，当地人就有这样的呼声：

美国迄今没有取缔神道的法律，我们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对夏威夷神道的正确与否作出裁决。神道总的来说是日本精神的代表，它类似法西斯和纳粹。（中略）在美国不允许神道的存在，一切与神道有关的机构都必须解散。涉嫌散播反美精神的神职人员应立即遣送回国。

可见，即使是所谓的移民神社，它也是当时扩张主义日本的精神代表，类似法西斯和纳粹。

四、东北地区的第一大庙——建国神庙

1940 年，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在关东军的一手操纵下，在所谓的皇宫内建成了“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

关于建“建国神庙”的计划是 1935 年 8 月由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最早向溥仪提出，1936 年动工，1939 年完成的。由于对祭神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迟迟不能进行镇祭仪式。按照神道习俗，神社应该祭祀当地神，所以很多日本神道学者和伪满洲官员极力主张祭祀孔子、关帝等中国神。而在关东军内部一开始，意见也不统一，据说有以下四种方案：

(1)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主张祭祀天神、明治天皇、清太祖和“日满烈士”；

(2) 同副参谋长石原莞尔主张祭祀汉族神；

(3) 同司令官植田谦吉主张祭祀各民族共同之神；

(4) 宫内府御用主管吉冈安直主张祭祀天照大神。

最后，通过“天照大神”案，美其名曰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皇恩下建立的。但日本国内特别是神道界极力反对把天照大神和所谓的“日满英烈”合祭，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是对皇祖神的大不敬。无奈之下，只好临时再增建类似日本靖国神社的“建国忠灵庙”。所以，两庙就在同一时间的1940年7月15日进行镇祭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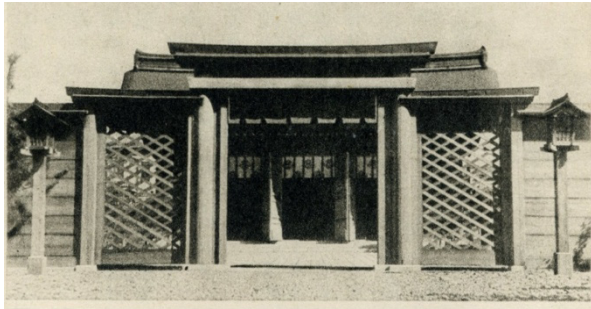


图6 建国神庙旧影

小 结

综上所述，我国东北地区的“在华神社”相对其他地方其成分尽管显得复杂多样，但对于上面提到“国家神社”、“都市神社”、“军队神社”以及“其它神社”的侵略性质皆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至于“开拓团神社”或“移民神社”，不能完全否认确实有一小部分出于移民自身朴素的民间信仰而建的因素，但很多还是融入了殖民地政策，难逃作为皇国思想宣传阵地而被利用的历史。

因此，应该从当时大环境下去分析这些神社的性质，即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明治维新后到战败为止的日本神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神社，它是国家神道的主要宣传阵地，是侵略扩展的化身。



图 7 建国忠灵庙旧影

梅德韦杰夫再登争议岛屿高调宣示主权 安倍希望继续保持对话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虎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不顾日方再三反对，于2015年8月22日上午访问了与日本存有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参加了全俄罗斯青年教育论坛，并视察了渔业加工企业、港口、商店、体育馆等设施。对此，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林肇致电俄罗斯驻日大使阿法纳西耶夫，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了抗议。同时，日本政府还推迟了外相岸田文雄原定于8月末9月初访问俄罗斯的计划。日俄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之中。

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库纳施尔岛、伊图鲁普岛、赫巴马伊群岛和施科坦岛被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由于领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俄日两国至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梅德韦杰夫曾于2010年11月和2012年7月分别以总统和总理身份两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梅德韦杰夫再次高调视察南千岛群岛，再一次传递了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体现了对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的重视。在俄罗斯深陷国内外政治、经济危机，俄日关系又起伏不定的背景下，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起到了“一石多鸟”之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国内外影响。其影响和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六点：

第一、2013年8月19日，俄日两国举行副部长级磋商，重启了围绕争议领土的谈判。梅德韦杰夫的此次访问“夸示”俄方对四岛的实效支配权，对日本摆出了强硬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俄日领土谈判争取了主导权。

第二、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有力推动了2015年8月10日俄政府批准的“2016至2025年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目标计

划”的实施和推进。

第三、2015年5月19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明了“占领南千岛群岛是二战的结果，改变这一结果或对此结果提出挑战，就意味着否定二战”的俄政府认识。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梅德韦杰夫用实际行动警告日本不要否定二战历史。

第四、在西方国家制裁等诸多因素影响下，2015年俄罗斯国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在前景未明的经济低迷下，爱国主义成为了保证国民支持的有效手段。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有效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促进了国内民众凝聚力的提高。

第五、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有力回击了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出新安法案不断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阐明绝不会放任日本同美国联手从亚太方向挤压自己战略空间的俄政府立场。

第六、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为主权国家后，日本政府于2014年3月18日对俄实施制裁，9月24日，进一步加大了制裁力度。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体现了对日本外交政策的不满，传递了警告之意图。

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再一次揭示了俄日间存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说明了真正调和两国矛盾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如此，安倍对“与俄交往”和“日俄首脑会谈”表现出了较高的期待和热情。在2015年8月24日举行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指责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伊土鲁朴岛之举，表示极其遗憾的同时，还指出为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将继续与普京总统开展对话，为其年内访日继续进行摸索。对于日俄关系，安倍讲道：“对于我国国家利益而言重要的是解决北方领土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并呼吁“为解决问题，努力推进谈判的必要性仍未改变”。那么，安倍为何在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日俄关系处于低谷之时还如此重视与俄交往和对话？

因领土、历史问题，中日、韩日关系长期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安倍将俄日关系视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安倍希望对俄外交的成果能够

成为“长期政权”的夯实基础。安倍个人对普京的对日政策抱有极大期待，密切关注着普京的一举一动。2015年6月20日，普京在圣彼得堡接受共同社采访时，针对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表示，“所有问题可解决，为此也有必要举行首脑会谈”。得到这一消息后，安倍立刻发表赞同声明的同时，6月24日，正式邀请普京访问日本，此举得到了普京的积极回应。但是，在普京访日计划进入实际准备和操作阶段之际，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让安倍不得不搁浅其计划。然而，安倍并没有放弃。他并不希望前期努力付之东流，采取了积极寻求补救之策，试图继续保持对俄交涉。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反核运动等因素，日本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增大，也成为了安倍改善日俄关系，推动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的重要动因。

一言而蔽之，梅德韦杰夫的南千岛群岛访问不仅高调宣示了主权，而且多方面传递了俄罗斯的国家政策意图，产生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尽管当前俄日关系因领土纷争还处于低迷阶段，但安倍政府的对俄积极政策说明，俄日两国将在今后“较短时期”内会重返谈判桌。但安倍能否获得普京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实质性让步——恐怕在他任期内不能使其得偿所愿。

“东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横滨召开



2015年7月4日上午,由日本鹤见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与台湾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大学会馆举行。

本次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法国、荷兰、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法师四十多人参加。日本鹤见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别顾问、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清孝教授,鹤见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伊藤克子教授,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教授,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凡法师等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作主旨发言。上午第一场大会报告有四位学者发言,下午举行了两场大会发言,分别由东京大学的蓑轮显亮教授和木村清孝教授主持。

7月5日上午,“东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转移阵地到山梨县本栖寺法轮堂举行第四场大会发言。本场主题为“人间佛教—

一以佛光山为中心”，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谢大宁教授担任主持。中山大学龚隽、佛光大学阚正宗、南京大学程恭让、南华大学尤惠贞、北京大学李四龙等学者先后发言（或代发言）。

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在本场发言中提出，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观察，有助于理解人间佛教的历史定位与发展趋势。同时，李利安教授借助 1998 年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的《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形态与发展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宗教存在形态论的观点，在与传统佛教的对比中，对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的新气象进行认识与理解，并就佛光经验为大陆佛教提供启示与推动现代化转型方面的历史机遇作了分析说明。上午的会议中，台湾“中央大学”万金川教授作了《汉传佛教经典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的主题发言。

（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第八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 专设与“东亚”相关的分会场

2015 年 7 月 4-5 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第八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国际秩序的动荡与重塑”，会期两天。

会议设有学术专题、圆桌交流、培训班、论文诊所、出版物展示等形式。旨在为学界同仁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反思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探讨国际秩序变迁的机制与路径，展望未来国际与地区秩序的形态与方向。

本届共同体会议举办专题讨论 116 场，参加年会的学者、官员、企业家、学生和记者达 1000 余人，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多所高校、研究机构、政

府部门、企业和媒体。



本次会议开设的发表会场中，与“东亚”直接相关的有“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机理与变迁”，“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I）、（II）等3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杨倩如以“周秦崛起路径与统一模式之比较研究”，上海理工大学社科学院副教授仇发华以“民族主义：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变量”，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事务研究所叶圣萱以“东亚秩序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以“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及其批判”等题目进行了发表，受到了参会者的关注与好评。

此外，在会议举办期间，《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等13份学术期刊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等10家出版社参加了期刊和图书展示活动。

（信息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年东亚鳎鱼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成功举办



2015 年 8 月 6 日至 9 日，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承办的“2015 年东亚鳎鱼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李彦亮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张显良院长、东亚鳎鱼资源保护协会曾万年会长等莅临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代表 130 余人参与此次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庄平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分别就鳎鱼的资源与捕捞、人工繁殖与病害、资源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做了 13 个专题报告，随后针对目前在鳎鱼贸易、资源监测、捕捞、增殖放流、栖息地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研讨会历时 2 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们共同针对东亚鳎鱼资源保护相关问题展开了具体和深入的研讨，通过该次研讨会加深了东亚地区鳎鱼资源保护相关各方的了解，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护鳎鱼资源的合作与交流。

（来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台湾大学举办“青年学者东亚儒学” 学术论坛



2015年8月10日，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主办的“青年学者与东亚儒学”学术论坛在台北召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主持了会议，台湾大学校长杨泮池、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出席开幕式并做了演讲。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明辉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英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等知名学者担任论文评议人，并与年轻学者进行了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关西大学、韩国江陵原州大学等东亚地区研究机构的13名青年学者就东亚儒学论题做了报告。

（信息来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网）

青岛农业大学举办 “2015年东亚合作社高峰论坛”

2015年8月11日下午，2015年东亚合作社高峰论坛青岛农业大学举行。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原永兵出席论坛并致辞。原永兵指出，2007年，青岛农大就携手日本、韩国的合作社专家学者和实践者举办了中日韩合作社组织学术研讨会，第二年更名为东亚合作社论坛，至此已连续举办8届，对深化东亚地区合作社经济学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互联互通、互帮互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国际著名合作社问题专家白石正彦提议并倡导，并经有关主办方、参与方初步协商同意，准备今年11月在日本佐贺召开的2015年东亚合作社高峰论坛期间，成立国际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学会。原永兵指出，成立国际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学会，青岛农业大学将全面参与、积极配合。



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协同组合学会原会长、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原起草委员及咨询委员（1995年ICA合作社定义价值原则起草人之一）、2015年东亚合作社高峰论坛轮值主席、国际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学会筹委会主席白石正彦，韩国农协大学校长南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等专家学者分别发表讲话，就国际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学会的名称、作用、业务及年会的举办等发表了意见。

青岛农大合作社学院院长、东亚合作社高峰论坛发起人之一、国际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学会筹委会成员李中华主持预备会议，并就学会成立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成立背景、名称、学会宗旨、学会组织机构、学会

活动以及章程的基本内容框架与起草、会员及相关人选推荐、会费、会刊与论坛编辑出版业务、成果评选与奖励等作了说明。

（信息来源：青岛农业大学网）

东亚德语法学家大会聚焦 “风险社会与大规模损害”

2015年9月12日至13日，东亚德语法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阿登纳基金会（KAS）资助。来自德国、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近80位中外学者围绕风险社会与大规模损害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指出，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应当充分保护人格权，尤其在当今互联网社会，人格权遭受侵害的风险极高，因此未来民法典中应当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仅凭侵权责任法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格权保护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宪忠研究员认为，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风险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也应当给予充分考虑。

德国民法学家舒尔策（Reiner Schulze）教授系统梳理了风险社会给侵权法带来的挑战，重点分析了大规模损害的特殊性及其对现代侵权法的影响。克尼佩尔（Rolf Knieper）教授认为，通过借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传统民法框架内仍可应付大规模损害问题，但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大规模损害的重要补充。东亚德语法学家大会致力于搭建东亚地区具备德国留学背景的法律人的交流平台，通过借鉴德国经验、结合各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现实问题，寻求最佳的法治之道。

（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报）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